

谢逢源稿本《龙川弟子记》

方宝川

《龙川弟子记》系太谷学派南宗创始人李龙川先生为教导弟子而口述的语录体著作,由其弟子谢逢源于清同治二年(1863)尊师命“载笔记言”编成的。^①

李龙川(1808—1885),名光炘,字晴峰,号平山,道号子炘,又号群玉山人,晚号龙川老人。江苏仪征人。道光十一年(1831),与其表兄张积中一起赴扬州,拜谒太谷学派的创始人周太谷。与之“辩难三昼夜,皆闻所未闻,因共受业于门焉。”^②次年春,李、张“复谒太谷于邗。授心法。夏四月朔,太谷终。”^③李、张等门弟子奉葬于仪征之青山。李、张二人受业太谷不及百日,而太谷则指定他们承衣钵,继遗志。

李龙川原为素封之家。为了实践师说,曾多次倾家赈济灾民。后家道中落,贫不能支。然身居茅屋,四壁萧然,收徒讲学,不改其乐。道光二十九年,移居扬州海岛巷。咸丰三年(1853),太平天国进军扬州,李龙川避乱迁于邵伯乡高桥。时刑部侍郎雷以诚聘请入幕,因政见不合,弗就。以后三、四年间,漂泊南北,行踪不定。同治元年(1862),率众弟子游江都龙川,择地集资,营建讲学之所,旨在实现周太谷要他“传道于南”的遗志。^④逾年,屋成,题曰“龙川草堂”。龙川草堂的建成与开学,标志了学派南宗的正式形成。同治五年十月,山东“黄崖教案”发生,张积中创立的学派北宗殉难殆

尽。为了避祸，李龙川一迁储家渡，再徙天滋河，三赴濠江，四奔如皋。由于迁徙无常，及门星散，龙川草堂亦赁为学塾，停止了讲学。七年，形势稍平，部分门弟子回到泰州，作重九之会，为师弟散后第一集。光绪三年(1877)十月，李龙川在被迫离开龙川草堂后的十二年，第一次回到江都龙川，重开讲舍。部分北宗黄崖子遗，亦历经劫难，辗转南来，转拜李龙川门下。十一年，李龙川病逝泰州，门弟子奉葬于仪征青山。

李龙川的一生，主要以讲学为手段来起续太谷学派道统。他为太谷学派在黄崖案后，能不绝如缕，发扬光大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尤其是在龙川草堂讲学以来，更是“来者不拒，兼收并蓄。”^⑤据《龙川夫子年谱》统计，先后拜从的门弟子有：王启英、王启俊、谢逢源、谢希鲁、吴子登、顾裕禧、江岷、顾牧、周璧、颜秀、刘燕成、祝楨、丁如愚、王树滋、陈士毅、蒋文田、郑来章、曹嘉福、王锦章、吴大全、吴篙庆、黄葆年、王锦明、康藉仁、刘玉山、熊景韶、吴尧臣、包德庵、周沛霖、王锦云、王锦春、唐人鉴、李贡镇、诸乃方、高文誉、吴载勋、李长乐、徐显照、达桂葆、张国英、赵永年、刘鸢、高尔庚、毛庆蕃、黄樾、刘梦熊、陈文铎、王月卿等等。其中既有达官名士，又有一般平民。得龙川衣钵者，则为黄葆年、蒋文田等。

李龙川讲学之余，亦有著述。据张德广所编《归群宝籍总目》著录有以下六种：《李氏遗书》、《龙川先生文集》、《龙川先生诗集》、《龙川弟子记》、《观海山房追随录》、《龙川太夫子遗著》。其中《龙川先生文集》、《龙川太夫子遗著》已佚。

谢逢源，初名麐，号石溪。江苏溧阳人，生于清道光十七年。咸丰九年，正式拜从龙川先生。龙川先生谓之曰：“学人最不宜吝，乃改名逢源，字平原。”^⑥咸丰十一年，随师往江都，筹建龙川草堂。同治二年，李龙川为了讲学的需要，又命“逢源载笔记言，曰《龙川弟子记》。”^⑦光绪三年，李龙川率众弟子重游龙川草堂之后，谢逢源南北追随，未离其师左右。光绪十一年(1885)，龙川归道山。谢逢源

将自己追随龙川先生二十七年的所见所闻，编为《龙川夫子年谱》。“俾后之闻风兴起之士，有访求龙川事迹，为文献之征者”。^⑧此后，谢逢源牢记师训，同黄葆年、蒋文田等人一起致力于发展学派事业，奔走大江南北，联络南北同学，实现了学派的南北合宗。年约八十，病故苏州。

谢逢源一生编著颇丰。据张德广所编《归群宝籍总目》著录，除了上述《龙川夫子年谱》、《龙川弟子记》之外，尚有《遂波词》、《俎豆记》、《东山草堂诗集》、《拳石山人余稿》、《谢平原先生遗集》等。其中后四种已佚。

太谷学派起于民间，传于民间，历代传人的著述多由弟子得之口授而笔录，以抄本形式供内部传道之用。清同治五年，山东“黄崖教案”发生后，学派门人韬潜避祸，著述更秘不示外人，几无刊本行世。1924年，太谷学派门人张德广（字令贻），有感于学派遗书珍秘不易得见，其诸孤本，尤惧湮没。遂矢志搜集学派遗书，并以个人财力雇请同学中贫寒弟子在苏州归群草堂抄录编辑。历经十年，终成《归群宝籍》正续编90种、307卷，《归群宝籍总目》1卷。由于当时张德广曾受到学派内部一些保守思想的影响，所编《归群宝籍》正续编及其《总目》，亦深藏固柜，不示外人。抗战爆发后，苏州沦陷，归群草堂所藏的学派遗书抄本开始陆续散出外流，颇多亡佚。至建国初，太谷学派遗书资料已罕为人知。十年“文革”动乱，部分残存学派后裔家中的遗书资料，再次历经厄运，欲绝如缕。

《龙川弟子记》现仅存稿本一种，藏先师刘蕙孙教授家中，至今未见有其他传抄本行世。该稿本红格稿纸，字体行草，笔力雄健，饶有气势。全稿凡线装四册，每半页8行，行字不等。内容不分卷，厘为内、外篇，以类编排。内篇设：“《图书》（附《九畴》）、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佛、道、天地、人物、政事”14目；外篇除了上述同样的类目外，又多设：“鬼神、文学、字说”3目。因为是未经删订之作，故其内容颇称庞杂，精粗不

一，前后尚有少量重复之处。该书不仅版本价值高，而且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李龙川的重要学术思想，具有不可多得的原始史料价值。兹将其主旨，揭示于下，以供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参考。

首先，太谷之学，归根儒家，以《易》为纲，旁通老释。该书论《易》的内容颇多，比较系统。其主旨在于阐发太谷之《易》学，其特点则在于旁证儒家其他经典，参鉴佛、道学说解《易》。例如：《内篇·易》曰：“乾坤是赤黑二气，人身中有赤黑二血，粘系命络。”《外篇·易》称：“乾坤，身命也；坎离，心性也。咸恒者，坎离之妙用也；既未济者，乾坤之变体也。离南，君道也；穷其君道之极至，曰先王。坎北，子道也；穷其子道之极至，曰后。后者，身也；先王，命也；大人，性也；君子合心性而言之也。故乾坤坎离为天道之本体，咸恒既未济为人道之大用。欲修乾坤者，必先修坎离；欲修坎离者，非咸恒莫能知也。坎者，陷也；山上有泽咸，君子以虚受人。虚则坎有孚，维心亨矣。离者，丽也；雷风恒，君子以立不易方。恒则继明照四方矣。老子以咸为谷神，以恒为不死；佛氏以恒为常住，以咸为真心；圣人以恒为礼门，以咸为义路；皆入德之门也。”又说：“乾之气象马，坤之气象牛。有气必有象，八卦皆然。艮为手，手者心也。君子以此洗手，退藏于密。洗手，即洗心也。尧舜授受心传也，曰：‘允执厥中’。”还说：“少华论艮其背，曰一阳止于重阴之上，曰天曰命曰君。《书》曰：‘道心。’内一阳止于至阴之中，曰地曰性曰臣。《书》曰：‘人心。’《大学》曰：‘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’一止也，绵蛮黄鸟止于邱隅；一止也，是皆止于至善之谓也……佛说见性成佛者，是出人心于至阴之中；见性即成佛也。道言既济成丹者，是合道心于重阴之上；既济成丹也。艮者，根也，万物之本也。佛说善根信根，道云天根地根，即圣人所谓人心、道心也……《孟子》曰：‘仁义礼智根于心’，其生色也。粹然见于面，即艮上九之一奇。盎于背，即中九三之一奇。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，即初二四五偶爻之作用也。”诸此，发明天人之际和修养途经，皆太谷《易》学之关键性的

问题。

其次，对儒家其他经典的注解与阐发，亦多有独特之处，令人耳目一新。例如：儒家各派对于人性善恶的理解，可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概而言之，有性善、性恶、性无善无不善、性有善有不善诸说。该书《外篇·孟子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孟子道性善，道以此也。性善者，性顺也。曲直杞柳之性，就下湍水之性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，火无有不上，木无不曲直，金无不从革，皆性善也。后儒不明善字之意，而以善恶之善解之，是以韩子有三品之说矣。……仁义礼智根于心，根于信也。视听言动根于心，根于思也。人之五脏皆系于背，背即畿微之真土。人思则必收视返听，而后所思之事乃通，即蠖屈求信之意。”阐明了太谷学派强调性善之“善”字的意义，并非善恶之善，而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一种人性良知良能的表露。又如《内篇·礼记》说：“《礼记》一部如廿一史，然是说人的念头。”《内篇·中庸》云：“素隐行怪是汉学，君子遵道而行。半途而废是宋学，君子依乎《中庸》。遁世不见，知而不悔，是空同之学。”《内篇·论语》称：“《论语》总钥是能近取譬，《孟子》总钥是反身而诚。”又载：“问‘非礼勿视’，何谓也？师曰：‘即佛氏所谓转法华也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，即是转识成智。非礼者，不能转也。勿者，物也。耳目手口，皆法华之轮。非礼勿视者，谓人不能转法华，即为法华转也。往来为礼。视听言动是往，声色香味是来。礼则见闻觉知，天下归仁矣。非礼者，目视而不见，耳听而不闻，不能开物以成务也。”《外篇·论语》说：“知之为知之，天道也，是乾以易知。不知为不知，地道也，是坤以简能。……性与天道，即在夫子文章之中，不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性是性，天道是天道。天道是乾以易知，性是坤以简能。”《内篇·大学》云：“知止戒也，定者定也，静者静也。知止而后有定一句中，得一字皆可成道。……穿窬而出者，神道也；泥凡而出者，仙道也。在二氏均谓之出家，惟圣人全受全归，不敢毁伤，故曰齐家。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也。”

《外篇·大学》又曰：“致知即是正心，格物即是诚意，知致而心无不正矣，物格而意无不诚矣。……曾子《连山》之学，首重诚意，故曰：‘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’身者，曾子合性命而言之也。子思、孟子则不然。孟子道性善，子思曰天命之谓性，是皆教人从致知入门，正心之学也。”以及“我非必欲求异于诸儒，实欲发先圣之心传，不得已也。学人只知遏欲去私，在心上讲求，虽百倍其功，终不能见性也。”诸此等等，均说明了太谷学派的儒学观有其特色，自认是数千年先圣之心法，口口相传之秘，其崇诸儒而立异，并非故意惊世以骇俗，而是自有渊源。

第三，太谷学派是否三教合一者，长期以来学术界人言人殊，莫衷一是。该书记录了李龙川在讲学中，曾较多地引用佛、道经典来说教，如《楞严经》、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妙法莲华经》、《坛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参同契》、《悟真篇》等。因此在内、外篇中，还专门设立“佛、道”类目，谈论佛、道二氏。然观其所云，亦只是贯彻周太谷、张积中以来的“窃比则为功，攻异端则为过”的思想，^⑨以便达到劝人为善和讲学方便的目的，实无兼宗之义。如《内篇·佛》说：“佛说度尽众生，方许成佛。人自无始以来，此身多如恒河沙数。一命分而为二，二而四，四而八，八而十六，以至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数。我身愈分愈多，我命愈分愈薄。身也，命也，皆我之众生也。身是后天，有成有毁。命是先天，无成无毁。学人修而合之，成一爻之数，亦可谓学矣。须知天命靡常，时可增锡，还原返本，学之至也。”《内篇·道》云：“道家以上清譬目，真境也；灵清譬耳，仙境也；玉清譬口，圣境也。佛氏以文殊譬眉，普贤譬口，观世音譬眼，地藏王譬耳。吾儒以曾子譬身，冉子譬心，颜子譬性，闵子譬命。”《外篇·佛》则曰：“道家重修身，谓有身而后有命。佛家重修命，谓有命而后有身。圣人教人身命合德，下学而上达也。……老氏说法，由实而空。佛氏说法，由空而实。圣人不偏不倚，中庸而已矣。……佛之修性，吾儒谓之修命，礼门是也。道之修命，吾儒谓之修身，义

路是也。圣人学《易》，二氏所谓转识成智，心息相依，太极是也。性命双修，身命合德，《中庸》之谓也。”很透彻地表明了自己对于三教异同和儒学精髓的看法。

第四，该书内、外篇《人物》一目，对身心性命的修养及天理人欲的关系，也做了十分精辟的剖析。例如：关于太谷学派十分注重的身心性命修养问题，其《内篇·人物》云：“人受命无始以来，或为人身，或为众身，所染清浊纯驳之习不一。轮至今，劫身虽不同，而命上带来业识犹在。朱子所谓：‘旧染之污’是也。命系于天，众身所不见也。譬若蛛丝下垂，上达者昌，下逮者亡。”《外篇·人物》称：“太谷曰：‘天之赋我曰命，父母赋我曰身，合德曰性。’众生不知身命是二物，皆从原始祖气而来。……天命，人心也；人心，天命也。人心有常，天命则有常；人心无常，天命则无常。此先天而天弗违者也。身心性命，只是身命性情。”又说：“心从息是下学，息从心是上达。无事时要心从息，有事时要息从心。息从心是主敬，心从息是存诚。只此知觉者命也，运动者身也，合德性也。又照管一身者心也，周流无滞者息也。皆身命之主宰，流行而会归于性者也。息也者，我与天地万物共之也。心息相依，即是万物一体，即是物我无间，即是人已合德。”其意思在于，人的身心性命就其各自的内涵而言，有着不同的特点，但具体表现在一个人的生命中，又是统一的整体。太谷学派一贯强调的身心性命修养途径，应由身而心而性而命，最后以至于天，即所谓的“下学上达”。只要以身体道，就可心息相依。实质上也就是《中庸》所说的“率性之谓道”。关于天理人欲的关系，则是太谷学派立异于宋儒的根本之处。其《外篇·人物》又十分明确指出：“天理不远乎人情，人情乖即天理蔑也。凡夫溺情欲紊三纲，二氏断情欲绝三纲，圣人不断情欲而不为情欲所牵，不绝三纲而不为三纲所累，以其所以异于凡夫、二氏也。”又说：“于天理中看出人欲流行，仁之至也。于人欲中看出天理流行，知之极也。故曾子曰：‘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，天下鲜者。’”虽然“好色好货好

勇皆人情也”，无可非议，但关键是在于不能沉湎其中。“一沉湎，便不可救药”。李龙川的这些大胆而精辟的论述，充分地肯定了“人欲”和“性情”的自然性与合理性，公开抨击和否定了宋儒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虚伪性，以及佛、道二氏的局限性。

第五，该书《外篇·神鬼》一目，体现了太谷学派一以贯之的“敬而远之”和“报本报德”的鬼神观。如曰：“神鬼一而二者也。君子上达则为神，小人下达则为鬼。鬼神之情状，圣人知之而不言也。以神道设教，则可与合其吉凶矣。……神鬼多以爱憎作威福，名利之习，未能忘也。故圣人敬而远之。……夷人祀上帝，知有受命之德，不知有受身之德也。华人祀祖考，知有受身之德，不知有受命之德。有身无命，身何以存？有命无身，命将焉寄？唯圣人为能享帝，唯孝子为能亲明乎郊社之礼、禘尝之义。治国其如视诸掌乎”云云。

第六，在现存的其他太谷学派遗书中，未见有系统或专门谈论政治的。该书则独立《政事》一目，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主张，这对研究太谷学派的政治观点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如《内篇·政事》曰：“井田之复，大率以三十年为断。其制：令凡有田者纳土，相其才，可官则官之，不可则予以世禄或以世职。凡庶人有田，准卖不准买，惟士大夫始得令买。不待三十年，而田尽入官矣。庶人授田，制唯百亩，士受则倍之。半以士并耕，半使人代耕。以今天下而论，欲平治，只须期月三年。若行王道，则非三十年不可。”很明显，所提倡的土地政策，旨在反对封建土地地主私有制。其具体方法是，渐渐由官府或士大夫收买民田，再使士大夫纳土授官，将土地逐步收归国有，实行授田等。这种作法，虽然空想成份很大，但已非单纯的“复井田”旧制，而是具有了新的内容，尤其是要求士大夫阶层也要兼耕的设想，更有创见。

此外，李龙川对封建政府机构的建置，也有自己的一套设想。如曰：“置官之法，每县置左右尹，分司其事，武备则置一千总理之。四县置一府，两府置一道，两道置一方伯。王畿内则置两宰，如周公

治东，召公治西之法。凡在外封建诸邦，皆统之封建之制。小者五十里，大亦不过百里。凡任官以三考为黜陟，其有贤能兴旷废职事者，不必拘此例”等等，均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。总之，太谷学派的这些政治主张，尚属书生之见，基本上是属于空想的。因此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，是根本无法实现的。

第七，该书《外篇·文学》一目，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李龙川的文艺理论，其中颇有不刊之论。如曰：“文之优劣，切题便佳。……不切题之言，虽锦心绣口不为之。切题之言，即俗语常言亦入妙。”“执理者，不可与言诗也。…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：‘峨眉山下少行人’，或曰：‘明皇幸蜀，不曾经过此山。’是皆以文害辞，以辞害志，只可讲考据辨字义，而不可与言诗。”以及“《木兰辞》：以‘卿卿复卿卿，木兰当户织’起，以‘两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’结，真是天仙化人之笔。若今人为之，必以忠孝节义为大手笔矣”等等，均体现了作者主张诗歌创作，着重在抒发性情，自然天成，而不必拘于理义，流于形式。泰州图书馆藏抄本《群玉山房诗钞》所附的《论诗文》、《论书法》二文，内容与此基本相同。估计《论诗文》、《论书法》二文，是根据该语录的这一部分整理而成。

第八，该书《外篇》所附《字说》，与张积中的《六书说文略》、《论语三十六虚声注》二文的性质相同，表面上均以解说文字为名，实际上说的则是太谷学派的某些修养功候。如曰：“必，心一则必。圣从耳，闻而知之。贤从目，见而知之。帝，肺字变相。……本阳在下，末阳在上。知，天命至如矢入口。天命至，则人知开”等等。

最后，必须指出的是，该书系谢逢源笔录李龙川讲学的内容汇编，由于龙川弟子众多，社会成份复杂，文化素质相差较大，而李龙川讲学又多因人施教，所以该书中尚有不少世俗神秘之语和牵强附会之辞。至于有些言论，看似预言，实为寓言，则另当别论。

注:

- ①⑦谢逢源:《龙川夫子年谱》“清同治二年”条。抄本。
- ②同上书“清道光十一年”条。
- ③同上书“清道光十二年”条。
- ④同上书“清咸丰七年”条。
- ⑤同上书“清光绪十一年”条。
- ⑥同上书“清咸丰九年”条。
- ⑧同上书《后记》。
- ⑨张积中:《张氏遗书》卷上《与秦云樵书(二)》。抄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: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

(上接196页)

- ⑭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:《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录补遗篇》史部诏令奏议类,1984年影印再版本,13页。
- ⑮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编:《奎章阁图书韩国版目录》史部1225页。
- ⑯故国川王,指高句丽第9代国王,在位期间为公元179年至197年。
- ⑰晏留,高句丽大臣,生卒年则不详。
- ⑱乙巴素:高句丽国相,生年不详,203年卒。
- ⑲指1882年7月23日发生于朝鲜汉城之壬午兵变。
- ⑳㉑㉒英文名称则不详,待考。
- ㉓指Martini-Henry式来福枪,今译马提尼-亨利。
- ㉔指Armstrong后膛炮,今译阿姆斯特郎。
- ㉕指德国军火企业Krupp,今译克虏伯。
- ㉖“生的密达”即英文centimeter即cm之音译,今译作厘米。
- ㉗原文于“病”、“来”字前均空一格。
- ㉘指朝鲜王朝首都汉城。
- ㉙指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